

ETHNIC
HISTORY
STUDIES

Series 12

民族史研究

◎ 苍
铭 / 主
编

第
十
二
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

民族史研究

ETHNIC HISTORY STUDIES 第十二辑

◎ 苍 铭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史研究·第十二辑/苍铭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660-0899-2

I. ①民… II. ①苍… III. ①中华民族—民族历史—文集
IV. ①K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9865 号

民族史研究·第十二辑

主 编 苍 铭

责任编辑 黄修义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899-2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明代北京的“回回”人	丁慧倩 (1)
明朝土鲁番朝贡使臣职官封授考述	姚 胜 (20)
试论明朝贵州卫所的特点	唐 莉 (39)
凤凰古城的形成、特色与存留原因	段阳萍 (52)
略论中美战略关系的演变与中国恢复联合国 合法席位	章毅君 (67)
《俄蒙关系史料汇编(1654—1685年)》绪论 Г. И. 斯列萨尔丘克 (Г. И. Слесарчук) 著 盛肖霞译 (84)	
明代的边疆秩序与族群划分 ——《中国国家的塑造：明代边界的族群和扩张》译介 王远振 孙晓平 彭 勇 (98)	
德国学者鲍克兰的仡佬族研究	苟 爽 (113)
“近代中国人的土耳其认知”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陈 鹏 (130)
墓志的史相：基于魏周赐姓书写的考察	王兴振 (152)
嫁接世系与望托东海 ——北周隋唐虜姓于氏谱系建构之考察	陈 鹏 (178)
从招抚到招讨：晚唐代北行营的分期与作用	胡耀飞 (192)
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译语人	朱丽娜 (212)
从堂子浴佛看满族的佛教信仰	李小雪 (229)

喀尔喀随围“射生手”考	刘 惠 (242)
阿月浑子考	肖超宇 (258)
伊斯兰作为回族“民族特征”的近代史 ——以民国时期泉州“恢复祖教”活动为例	杨 阳 (272)
於越族源问题考论	陈民镇 叶 岗 (282)
战国秦汉西南百濮考	陈昱文 (305)
汉晋时期的盘瓠故事 ——一个历史民族志文本解读	胡泰山 (314)
《全唐诗》中“瘴”的含义	严 赛 (330)
明代黔东南的府卫设置与配合 ——以思州府为个案的研究	郑 宁 (345)
点校本《明史·贵州土司列传》考误十则	武晨微 (365)
明清海南黎汉民族经济圈层及地域结构初探	申志锋 (378)
明代川西三系羌人演变研究	张超亚 (404)
乾隆朝杂谷事件及其善后事宜探	刘埤超 (417)
略述清前期藏传佛教宁玛派的历史影响及原因	朱金柱 (433)
西藏噶伦制的形成与确立	张 钦 (448)
从民国报刊资料看彝族土司岭光电两次赴南京请愿事迹 ——以四川、南京报刊为核心	关 昉 (465)
拉祜族女服中的银泡元素初探	饶书剑 (482)
筑西夏政权之基，聚党项民族至大 ——再论李德明	王又一 (493)
后记	(507)

明代北京的“回回”人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丁慧倩（回族）

摘要：明代，“回回”人在北京城内外已形成聚居区。各聚居地相对分散，自成区域。而区域内部，“回回”人以清真寺为核心聚集居住，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回回”官员群体在明代北京地区的出现，不仅与都城由南京迁移到北京有直接联系，还与明朝处理元代遗留的“回回”人和明代内附人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宗教信仰、生活风俗的差异，北京发生过官民、回汉冲突。而特殊的信仰、风俗与本地文化的融合，也造就了回回民族在语言、建筑等方面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明代；北京；“回回”人

“回回”人在今北京地区定居的时间至迟开始于元代。伴随着蒙古人的西征，大量中亚“回回”东迁，成为元朝的编户齐民，形成“回回遍天下”的局面。由于这些“回回”人（尤其是“回回”上层）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他们在元大都（今北京）的官僚机构中充任要职，自然就落居于此。此外，“回回”人善于经商，“西域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城巨邑，必居其津

要，专其膏腴”^①，定居大都的“回回”人商人数量也很可观。王恽在《乌台笔补·为在大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一文中记载了世祖中统四年（1259）大都地区“回回”户的情况：“今体察到本路回回人户，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统四年续抄，计二千五百九十三户。”有学者认为如按一户五口计算，当时大都的“回回”人应不少于15000人。这些“回回”户“于内多系富商大贾兼并之家”^②，看来在大都居住的回回人中商人占有很大的比例。今北京牛街礼拜寺内保存有两座元代“回回”人的墓，被称为“筛海坟”，其中阿合默德·布尔搭尼卒于1280年，即元世祖至元十七年；阿里卒于1283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③从碑文上看，此二人都是“竭其毕生之力以从事于主道者”，“宗教之有力宣传者”，可见居于大都的“回回”人中亦不乏宗教人士。北京地区计有锦什坊普寿寺、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通州朝真寺、东直门外二里庄清真寺、马甸清真寺、顺义回民营清真寺、房山常庄清真寺等几座清真寺相传为元代所建。^④

元明鼎革，新的王朝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相号召，力图恢复汉人为主体的政权，包括“回回”人在内的各色名目之人都不免受到冲击。“回回”人从元代二等人的高位上跌落，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均受到较大的影响。不过，政局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回回”人在中国销声匿迹。

①（元）许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全元文》卷1197，第38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

②（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8，《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36页。

③ 此二碑为阿拉伯文，本文采用的是赵振武的翻译，见白寿彝文，《禹贡》第五卷第十一期，1936年5月。

④ 各清真寺的建寺传说有多个版本，除了相传建于元代外，也同时存在明代建寺的不同观点。另外牛街礼拜寺和东四清真寺的建寺传说更可提早到辽代。

在北京，自明成祖迁都之后，在京“回回”人的聚居区渐成规模。据成书于清代的《冈志》记载：“明宣武门之西南，地势高耸，居教人数十家，称曰‘冈儿上’。居者多屠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内东、西牌楼，号曰‘东西两边’。”^①可见明代的东四、西四一带和冈上地区（即今天牛街一带）均为“回回”人聚居之地。这些“回回”人有的在朝廷中出任官职，有的以经商为生，在当时的北京形成规模。

回族民间素有“十大回回保明朝”的说法，北京朝阳区的长营，在清代以前称“常营”，传说是常遇春的军营。常营常姓回回人后裔在改朝清代时迁住张家湾。^②房山区的常庄胡姓回民认为常庄是常遇春的一部分军队由当时胡大海带领而形成的。此外，还有常遇春修建崇文门外花市清真寺，并支持部下和驻守官兵兴建前门外笄帚胡同清真寺的传说。尽管这些传说逸话难以考证，但足见明朝的建立对北京“回回”人的定居生活颇具影响。至于这些“回回”人的来源，《冈志》上说：“今燕都之回回，多自江南、山东二省分派来者，何也？由燕王之国护围军僚多二处人故也。”^③这说明北京地区的回民认为自己是随“燕王扫北”而来，其中任、沙、刘、李、马、金、霍等姓的祖籍大多在南方。^④时至今日，北京的一些回族仍说他们的祖先是“揪着龙尾

①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冈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② 参见回宗正：《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内部发行。

③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第35页。

④ 参见彭年、刘盛林：《北京回族》，载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巴”来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明代定居北京的“回回”人中应有部分籍列军户，与民人不同。他们的迁移和定居与明初北京地区的戍守和建都有直接的关系。

明代“回回”人在北京的定居状态可以从清真寺的分布窥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在明朝时存在二十几座清真寺。一些清真寺至今保存有明代的修寺碑刻，另一些清真寺则在民众口碑传说中相信其在明代即已存在。^①下面，我们对有文献依据的清真寺逐一介绍，以此粗略考察明代“回回”人在北京的定居情况和分布格局。

坐落于今北京市东城区的东四清真寺保存有明代（大约景泰年间）《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等资料，表明这座清真寺在明代便颇具规模，是此地“回回”人宗教生活的中心。其中《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讲述的是当时的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即后来的武平伯陈友修建东四清真寺的过程，从中可以了解到，东四清真寺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初名为“礼拜寺”，到景泰年间获得敕额“清真寺”。^②

位于西城区锦什坊街的普寿寺至迟建于明代（该寺有建于元代的传说），据成书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宛署杂记》记载：“普寿寺，古刹；普照寺/护国寺；鹫峰寺，正德四年建。以上俱在金城坊。”^③可见普寿寺位于明代的金城坊。该寺今日所留碑刻文物不多。民国时期，唐宗正在《锦什坊街清真寺》的调查文章中提到该寺仅存的一些石刻残件上有“崇祯岁次乙亥春月谷旦重修”“大明天启某年重修”等字样，可以推测该寺在

^① 参见金吉堂：《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月华》，1947年6月号，收入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87页。

明代曾多次修缮。^①至于其何时受到敕封，实难稽考。

原安定门内二条法明寺，存有明万历八年（1580）碑记，称：“寺成，蒙恩赐额曰法明寺。盖经始于正统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落成于明年五月五日。”^②可知该寺建成之后于正统十三年（1448）得到敕封。今东四清真寺内保存的明万历七年（1579）百字圣赞碑，即为法明寺的遗物，因清末法明寺失火，将石碑移入东四清真寺。

今西城区牛街清真寺位于明朝初年北京城的城外，被称为“冈上”的地方。据《冈志》记载，由于嘉靖年间京城增筑外城，冈上地区成为城内地。牛街清真寺现存明代碑刻三通，从已经残缺不全的碑文记载看，该寺在宣德至弘治年间多次修缮，建筑齐备、规模宏大，并于成化十年（1474）获得敕名“礼拜寺”。

以上四座清真寺即明代北京四座敕建清真寺，其中东四、普寿、法明三寺位于内城，牛街礼拜寺位于外城。牛街地区的另一座清真寺可能也建于明朝。据《冈志》记载，明崇祯年间冈上地区教众因礼拜礼仪的分歧，由杨、李二姓捐资在东街路西创建新礼拜寺，俗称小寺、东寺，即原教子胡同清真寺。在明代外城，还有花儿市清真寺。该寺遗留的建寺条石刻文称其于“大明永乐十二年岁次甲午春正月吉旦修建，崇祯元年岁次戊辰秋仲月吉旦重修……”可知该寺在明代也经多次修缮，宗教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① 参见唐宗正：《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七：锦什坊街清真寺》，《回教》，1939年第2卷第3期，收入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7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9页。

目前所知的明代北京地区其他清真寺皆位于城外。如阜成门外三里河永寿寺，依照现存碑文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有“本教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寿、锦衣户侯董应元，协内外官庶教众各捐己资，易得阜城关外三里河翁僧荒堂一区，遂营筑坛宇，择任住持”。^① 明清时期的三里河是“回回”人坟墓最多的区域。《明实录》景泰七年（1456）五月，“撒马儿罕等地面使臣指挥马黑麻舍力班等，请游在京诸寺及出阜城门外祭扫祖坟，从之”。^② 日本学者田坂兴道据此认为：“景泰年之前及更早在阜城门外（可能就是今三里河）回教徒专用墓区已经相当大，并且是北京最主要的回教基地。”^③ 如果马黑麻舍力班祭扫的祖坟在三里河，那么这里有“回回”人筑墓的历史就早于三里河清真寺的修建。不过民间传说三里河清真寺创建的时间是远远早于万历的宣德年间（1426—1435），也比马黑麻舍力班扫墓的时间要早几十年。由于受材料所限，三里河清真寺和“回回”人墓地的最初缘起已难稽考，不过这一地区在明代即建有清真寺是毋庸置疑的。

通州朝真寺存有不明年代的石碑一方，书丹人为武平伯陈如松。检阅《明史·功臣世表》可知，陈如松为第一代武平伯陈友的六世后裔，其袭封、卒年均不详。对照《明实录》，陈如松出现在从万历十三年到四十年（1585—1612）的记载中，可见这

^① 《重修清真寺碑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9册，第152页。

^② 《明英宗实录》卷266，景泰七年五月丁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本，1962年，第5647页。本文所引《明实录》均为该本。

^③ 参见王东平：《北京三里河清真寺〈重修清真寺碑记〉笺证》，《回族研究》2008年第2期。

块碑很可能写于万历年间。^①

昌平何营清真寺建于伯哈智墓苑旁。据墓内明万历六年(1578)《重修先贤碑记》记载:“先贤祖师名伯哈智,作坟始自太祖高皇帝念其献兵策有功所赠也”,^②并建有清真寺。此后又经多次重修、维护,足证该墓园在明代一直为“回回”教众悉心管理。

昌平清真寺始建时间不明,但寺中留有明万历年间修寺碑文,据此可知该寺“因改建公宇”^③而移建,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刻碑记事时已复建完成。

此外,海淀区蓝靛厂清真寺存有清光绪十一年(1812)石碑,碑文称该寺“建于前明”。^④昌平西贯市清真寺原名为灌石村清正礼拜寺,寺内清代碑刻追述:该寺建于明弘治七年(1494),并于嘉靖二十七年(1737)重修。据传本地“回回”人随燕王朱棣北上来京,村中回民姓氏甚多,尤以李姓为最。其他清真寺虽多有明代修建的传说,遗憾的是没有文字记载或考古发现相印证,目前只能存疑。

从上述明代清真寺的分布看,当时“回回”人在北京城内、外都已形成聚居区。各聚居地相对分散,自成区域。而区域内部,“回回”人以清真寺为核心聚集居住,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

① 金吉堂在《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一文中记载陈如松于万历二十一年重修直隶通州朝真寺。陈如松还撰写了刻于万历四十四年的《重修礼拜寺碑记》。

② 回宗正:《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第438页。

③ 回宗正:《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第217页。

④ 回宗正:《北京清真寺碑文辑录述要》,第236页。

二

在明代北京“回回”人中，官员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从各处清真寺修建碑文的题名和碑阴记载中，可以看到很多文武官员、宦官的名字。《冈志》上也称教内有官爵之人多住在内城东、西牌楼一带，那里在明代均建有清真寺。

李兴华在《北京的伊斯兰教》一文中开列了历史上北京地区的回回人文武官员、各界人士，其中明代的人物很多，他们的后裔一直定居北京，《冈志》上出现的“武平伯陈家、大轿子何家、皇亲马家、谭指挥家、卢指挥家、钦天监吴家、马家，皆明之旧族也”。^①

独力修建东四清真寺的武平伯陈友主要活动于明正统至天顺初年。查《明史》有《陈友传》，附于《方瑛传》后：

陈友，其先西域人，家全椒。正统初，官千户，累迁都指挥僉事。频年使瓦剌有劳，寻复进都指挥使。九年充宁夏游击将军，与总兵官黄真击兀良哈。多获，进都督僉事。未几，出塞招答哈卜等四百人来归。

景帝即位，进都督同知，征湖广、贵州苗。寻充左参将，守备靖州。景泰二年偕王来等击贼香炉山。自万潮山入，大破之。留镇湖广。论功，进右都督。四年春奏斩苗五百余级，五年又奏斩苗三百余，而都指挥戚安等八人战死。兵部疑首功不实，指挥蔡升亦奏友欺妄。命总督石璞廉之。斩获仅三四十人，陷将士千四百人，宜罪。诏令杀贼自效。

天顺元年随瑛征天堂诸苗，大获。命充左副总兵，仍镇湖

^① 刘东声、刘盛林注释：《北京牛街志书——〈冈志〉》，第32页。

广。已，又偕瑛破蒙能余党。召封武平伯，予世券。孛来犯边，充游击将军，从安远侯柳溥等往御。率都指挥赵瑛等与战，敌败遁。再犯镇番，复击却之，俘百六十人。寻佩将军印，充总兵官，讨宁夏寇。先是，寇大入甘、凉，溥及总兵卫颖等不能御，惟友稍获。至是巡抚芮钊列诸将失事状，兵部请免友罪。诏并宥溥等，召还，进侯，卒。

传子至孙纲，弘治中，请友赠谥。诏赠沔国公，谥武僖。纲传子勋及熹。嘉靖中，吏部以友征苗功多冒滥，请停袭。帝不从。熹子大策复得嗣，至明亡乃绝。^①

从陈友传记记载看，陈友的祖先来自西域，他在正统至天顺朝为国效力，著有战功，不断受到封赏，从千户升为指挥僉事、指挥使，都督僉事、都督同知，后晋封伯侯。陈友以这样的身份创建东四清真寺，又为该寺请得敕封，使东四清真寺位列明代北京四大官寺之一。

陈友修建清真寺的活动被他的后裔所继承，据金吉堂于 20 世纪中期的研究显示，陈氏子孙与清真寺等伊斯兰宗教事务之间曾发生过多联系，不仅时间跨度终明一朝，而且空间范围也超出京城局限。

陈氏子孙与教门发生的关系可列作下表：^②

陈友	始封武平伯，晋爵创建敕赐清真寺	正统十二年
陈能	为敕赐清真寺请书碑文	景泰元年

① 《明史》卷 166，《列传第五四·方瑛列传附陈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489 页。

② 金吉堂：《敕建清真寺的五百年》，第 498 页。

续表

陈勋	助修直隶定州礼拜寺 助修山西大同礼拜寺	弘治年间
陈熹	为直隶定州礼拜寺领札副	正德年间
陈大策	为敕赐清真寺住持马颙立碑 刊行明武宗评各教语 重修山东济南府礼拜寺 重修直隶易州礼拜寺	
陈如松	重修直隶通州朝真寺 重修直隶昌平州礼拜寺并撰碑文	万历廿一年 万历四十四年

陈友一家可算是明代北京城最有地位和活动能力的“回回”家族。金吉堂曾评论说：“明朝回回功臣助力礼拜寺可考者甚多，如陈氏发于爱教热诚独力建寺尚属仅见。至如陈氏身封侯爵，传至子孙，与国祚同休，无一世不与礼拜寺发生关系。古来回回富贵者多矣，富贵而能爱教，爱教而能传及后裔，累世不替，陈氏实为独步。”^①

再如修建三里河清真寺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李寿、司礼监文书房太监金良辅也曾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在明代的中央官僚体系中，宦官虽为家奴却参与政治生活，受到历代皇帝的倚重。而司礼监作为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事权更重。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在“司礼掌印之下，则秉笔太监为重。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秉笔内官遵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

^① 金吉堂：《敕建清真寺的五百年》，第496页。

批行，遂与外庭交结往来矣。”^①由此可知李寿作为“秉笔太监”权势极重。明代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对李寿的情况有更为详细的记录：

司礼监随堂李太监寿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一年选入，历任司礼监监官。至万历二十九年夏，收选官人四十余名，累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选福王妃时，皇贵妃郑娘娘引潞王例，欲选三人而择之。先监矩时总理婚典，寿执往事争曰：“潞王先选一位未中，复选二位，虽三人其实二也。如何敢比？”先监甚服其亮，而密荐之。后升随堂，未竟厥施，而一疾令终，神庙悼惜之。今司礼高、沈二位皆张太监诚名下也，屡有忌者，欲汰斥之，皆赖李及先监主持，培植为今上圣主重臣云。^②

金良辅也同样出现在《酌中志》中：

金良辅……北直人，二十九年选入。泰昌元年冬，逆贤奏升司礼监，任文书房。良辅，正阳等门提督。^③

金良辅所在的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④。可以看出，文书房的太监极有机会升迁入

①（清）夏燮：《明通鉴》卷19，《宣德元年七月》，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03页。

②（明）刘若愚：《酌中志》卷22，《见闻琐事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3页。

③（明）刘若愚：《酌中志》卷15，《逆贤羽翼纪略》，第89页。

④《明史》卷74，《职官三》，第1822—1823页。

司礼监，就像外廷的詹事府是“翰林官迁转之阶”^①一样。金良辅任职文书房是魏忠贤奏请，因而《酌中志》将其列入“逆贤羽翼”款中。

明代北京地区聚集大量“回回”官员的状况，不仅与都城由南京迁移到北京有直接联系，还与明朝处理元代遗留的“回回”人和明代内附人（其中有“回回”人）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明洪武年间，明廷对北元采取招抚政策，数十万故元官兵或归附或被俘，受明朝统辖，其中不乏“回回”人。和癸在其合著作品《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一书中，着重考察了明代西域入附“回回”人的情况。其研究显示，受明代西域政治格局的消长向背和明朝国势隆替盛衰的影响，有大量西域“回回”人内附明朝，在洪武年间开始持续不断，到正统至正德年间进入高潮，嘉靖以后逐渐稀疏。这些被收复的故元官兵和主动内附的西域之人被安置在大江南北，其中北京作为明帝国的都城，也是重要的安置地之一。^②如英宗天顺元年（1457）二月曾“命兵部，凡来降达子、回回俱留在京安插”。^③前文提到的武平伯陈友便发迹于明英宗时期。明末谈迁《北游录》中提到牛街礼拜寺，称其“成化中赐额，西域回回降人诵经处”。^④可见，明朝特殊的政治形势造就了北京地区“回回”人的定居与分布状态，大量“回回”人官员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自元代以来便颇具传统，牛街礼拜寺内的两座筛海坟说明自元代开始，北京地区的伊斯兰教就不

① 《明史》卷74，《职官三》，第1785页。

② 参见林松、和癸：《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③ 《明英宗实录》卷275，天顺元年二月甲寅，第5853页。

④ （明）谈迁：《北游录·纪邮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8页。